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n Asian Langu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Jiaqi Liu^{1,a}

¹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a liujq557@zju.edu.cn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n Asian languages, linguistics can provide a rich basis in three aspects: loanwords, mixed languages and language strategi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sian civilization and language research. Firstly, loanwords are the product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Studying th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oanwords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of ethnic groups in a specific period. Secondly, there are many situations of Asian language contact, and a lot of mixed languages have also been produced, which can reflect the civilizati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 certain n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ddition, facing the advanced and powerful Western modern civilization at that time, Asian languages adopted various countermeasures to protect their ow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providing evidence for the study of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linguistics can provide rich evidence and novel perspectives for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make due contributions to Asian civilization and language research.

Keywords: Modern civilization, linguistics, loanword, mixed language, language strategy

语言学视角下近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

刘家琪^{1,a}

¹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杭州, 中国

^a liujq557@zju.edu.cn

摘要

在近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的研究中, 语言学能在借词、混合性语言、语言应对策略三个方面提供丰富依据, 在亚洲文明和语言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首先, 借词是文明、历史、文化交融的产物, 通过研究借词的出现与发展, 有助于了解族群在特定时期的文明交流互动; 其次, 亚洲语言接触情况繁多, 也产生了较多混合性语言,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个民族的文明渊源和发展进程; 此外, 面对当时先进而强势的西方近现代文明, 亚洲语言采取了多样的应对策略保护自身的语言和文明, 为亚洲语言和文明特质研究提供证据。因此, 语言学能够为探究近现代文明在亚洲语言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影响提供丰富的证据和新颖的视角, 为亚洲文明和语言研究做出应有贡献。

关键词: 近现代文明, 亚洲语言, 语言学, 借词, 混合语, 语言策略

1.前言

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地形地貌使得亚洲拥有着

最早的农业和草原游牧文明、众多文物古迹和重大研究价值。此外, 亚洲孕育了多数世界上影响力较大的宗教, 并用繁荣的商业贸易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亚洲人口众多，民族多样，与其他地区文明交流繁多，也因此产生了多种世界上重要的语系和语言，最终形成多语言多民族交流、交融、共生共存的局面。而多元共生的文明模式也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便利，在推动亚洲语言和文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业起源后，亚洲文明一度被西方文明占据了主导地位。开始出现了西方向东方渗透的局面，且对部分海岛国家影响深远，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亚洲语言的版图。由于亚洲地区国家民族的多样性，不同国家应对文明冲击的反应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些国家较快地适应了近现代文明的冲击；也有些国家的语言系统发生了改变。虽然在近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亚洲各国语言都发生了些许改变，但整体亚洲语言的格局并未像非洲一样产生较大的动摇，这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亚洲文明和亚洲语言的韧性和特质。

在此背景下，研究近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有助于探索语言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为亚洲文明的研究提供一个语言学视角。客观对待语言、文明多元性的同时，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继承和发扬博大精深的亚洲语言文字和亚洲文明。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缺乏部分史料证据、文明交流繁多等原因，语言学和文明研究的结合程度有所下降。

本文从借词、混合语、语言策略三个角度探讨近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旨在说明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近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而语言学也能够作为文明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深化亚洲语言和近现代文明的关系，跨越时空限制探知文明的传播与互鉴，发挥语言学在亚洲文明研究和亚洲语言研究中的作用。

2. 亚洲借词的发展与近现代文明

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大致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工业

表 1 受到多国影响而产生的印地语外来词

波斯语		土耳其语	
लाश	尸体	चाकू	刀
सराय	旅店	रानी	皇后
सरकार	政府	सही	权力

阿拉伯语		英语	
कुरान	古兰经	अस्पताल	医院
दवा	药	मशीन	机器
वकील	使团	कार्यालय	办公室

不仅有被动接收外来语言词汇的语言，也有些亚洲语言曾主动吸收其他国家的语言词汇，从而完善自身语言体系，适应日常生活交流需要。希伯来语一向

革命之前属于“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其以后则属于“近代”(modern)(钱乘旦 2021)^[1]。纵观世界近现代发展历程，思想和文化在语言发展和思想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近代以来，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后经济实力迅速发展，西方文明随着新航路开辟快速向世界各地扩散，通过“战争资本主义”打造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王灵桂，徐铁杰 2019)^[2]。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亚洲文明开始了遭受殖民和半殖民的入侵，曾经占据世界文明制高点的亚洲文明逐渐开始暗淡。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文明加速了其扩散速度，也开启了世界近代进程。

在近代的思想和文化日渐兴盛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各个国家之间交流密切，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出现了多种语言的语法书籍，也加剧了词汇的借鉴。“外来词”也称为“借词”，是展现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产生的影响的有效因素。借词的出现大多归功于语言的接触。语言接触可使得相关语言之间在一些层面上相互借用、影响，从而产生趋同效应，形成相同或相似的特征。亚洲幅员辽阔，在历史进程中曾和多个国家或族群产生过语言和文明接触，由于地理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语言接触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从而反映出文明的碰撞与融合程度。接触程度较浅一般只能体现在器物名称的借用方面，如通过丝绸之路等方式引入的西域词汇“葡萄、琵琶”等；而深层次的接触则能够体现在数词、亲属词等核心词方面，如朝鲜语对汉语“父亲、母亲”等亲属词的借用(安英姬 1985)^[3]。

除了地理位置和对外交流带来的文明交流，战争入侵、宗教传播等因素产生的民族接触和文化影响可以很好地通过借词展现出来。以印度为例，在近现代时期，英国等欧洲国家入侵、殖民印度，英语等欧洲词汇渗透进了印地语中，西方宗教文化也在不断影响印度的宗教文化，逐渐出现了许多来源于欧洲各国的外来词汇(如表 1)：

被认为是一种“命途多舛”的语言，经历过日益淡化甚至一度消亡。当今希伯来语的词典中，约有 10% 的词汇可能来源于外国，尤其是西方(Berman 2005)

[4]。现代希伯来语在十八世纪末期开始兴起，从中欧传播到了东欧，传播的主力是犹太作家与启蒙运动相关的学术知识分子。以本·耶胡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借助翻译，在希伯来语词汇的基础上，借助阿拉伯语借词并使其形式适应希伯来语，以此建立词库，并解释如何使语言适应日常需要。本·耶胡达从密西拿（Mishnah）、塔木德（Talmud）和米德拉什（Midrashim）中提取了能够使用的希伯来语、阿拉米语（Aramaic），其中甚至包括可供借鉴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借词。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借词是文明、历史、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借词研究是描写语言事实及认识语言结构体系的需要（王如利 2021）^[5]。由于亚洲地区幅员辽阔，是新航路开辟后西方国家文明交流、接触的主要地区，亚洲语言中融合了较多的借词。部分学者在借词研究领域也作出了较多贡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在通过借词进行语言接触时间溯源（Schmitz 2014）^[6]（朱京伟 2020）^[7]；通过借词对语言在语言学层面进行探讨，如（张海燕 2016）^[8]。尽管借词研究需要借助大量古籍、词典，且部分语言的所属关系没有明确，但借词背后折射的民族、文明的交流情况不容忽视。

借词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也是一种文化表达。由于借词承担了差异性文化之间的交流任务，在跨文化的空白翻译领域也能够起到桥梁的作用。因此在翻译中，当一门国家的语言不能用另一个国家的语言进行有效翻译时，便会借助前一国的语言借词来达到有效翻译（尚建国 2015）^[9]。以日本与中国的交流为例，近代以前，汉语在日语中留下借词几乎占据了日本词汇的 1/2，明治维新之后日语开始向中国输入大量借词，如“哲学、浪漫”等等。借词在极大程度上减少了语言体系不对等带来的语言碰撞，对各自社会的文明进步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可惜的是，借词研究多数聚焦于语言内部带来的影响，如借词语类、语音、语义方面的变化，鲜有从文明的宏观角度对借词的产生、改变、渊源等方面进行讨论。随着亚洲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以及对亚洲语言和亚洲文明的不断重视，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学对于了解亚洲文明的重要性，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借词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因素，开始从语言层面发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如 Liu and Song（2016）^[10]根据借词的方式将借词分为几个不同的变种，按年代顺序论述了外来词的社会文化功能；Erdenibaatar（2017）^[11]从元代蒙古文献中的汉语借词窥探其背后的文化接触。但是，由于文明的产生与演变往往是相辅相成、具有前后因果关系的，单单以借词为核心进行定性研究，分析其背后的文化底蕴无法准确的对文明因素进行宏观考量，而反过来从文明和历史角度对借词进行定量研究，能够更好地使借词的产生与改变研究更加准确，对其背后的文明因素进行宏观考量。

因此，基于文明角度，对语言学层面的借词进行

定量研究能够为亚洲语言和亚洲文明特质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通过对受文明互鉴影响而形成的借词进行研究，可以窥探与亚洲国家或族群有关的文明交流活动，讨论近现代文明对亚洲各国家民族语言层面的影响，既对了解亚洲语言和文明交流的历史情况必不可少，也对思考未来如何构建具有深厚文明底蕴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文明交流互鉴下的语言混合

除了词汇体系的扩充和改变，语言的其他层面如语法、语序、语音等也会随着文明的交流和碰撞发生变化，而混合性语言便是文明交流和语言接触的产物之一。一些族群因政治、战争、通商、传教、联姻等原因与其周边族群产生交流互动，不同语言或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由于接触而相互影响，从而带来语言接触现象。Thomason（2003: 21）^[12]认为“一个混合语的句法和词法的子系统不能完全追溯到单一的源语言”。混合语和源语言不同，但在词汇、语音、语法等层面与源语言有较强的关联，能独立完成社交功能。

当语言接触在非平衡的状态下发生时，混合性语言便会产生。所谓非平衡状态主要包括人数较多的当地人需要跟地位较高的少数外来人口交流，以及数量较少的人迁徙到另一区域。在前者的状态下，当地族群会基于外来语言对自身语言加以简化，形成洋泾浜语，甚至能发展成为母语克里奥尔语，例如在东印度群岛上常用于商贸的“市场马来语”。在后者的状态下，族群既为了维持自身的民族语言，又要和当地族群融合，所以会采取将两种语言的语法、语序、短语、词形等交叉融合的方式，由此形成的语言便成为“混合语”（Bakker, Mous 1994）^[13]。

混合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19 世纪左右在美国和加拿大接壤地区形成的 Michif，这种语言的动词大多来自于当地土著印第安人，而名词则来源于当时法国的皮货商人带去的法语。此外还有形成于 19 世纪的 Mednyj Aleut 语言，是当时在库伯岛经商的俄国商人带去的俄语和当地语言结合的产物。在新航路开辟后的近现代，西方文明和亚洲文明开始了跨度范围较广的文明交流互鉴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语言接触，也因此亚洲地区形成了多种混合语。典例则是斯里兰卡马来语，其语法结构来自于当地语言泰米尔语和僧伽罗语，但词汇和词素则源于在 17 至 18 世纪被荷兰和英国殖民者流放的印尼和马来西亚人所讲的马来语（Velupillai 2015: 75-76）^[14]。

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通常由该民族对自身的认识、该民族在外族人眼中的价值以及对外族人的态度组成（Haarman 1986: 213-214）^[15]。本土族群通常将外来文明视为整体，对外来种族的文明、语言等方面的态度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地族群对外来文明的态度。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混合语不仅仅是源自两种或多种语言的接触，也是两种或多种文明的交融。当地族群也在逐渐借用外来语言并进行相应的语

码转换来体现自身独有的规范和语言倾向。

就混合语发生的条件和阶段而言, Bakker 和 Mous (1994: 5-6) [13] 认为当借词比例达到 90% 时就会发生语言混合现象。外来语和本族语的碰撞融合有很多形式, 包括和谐共处、部分吸收、部分同化和彻底改造 (何安平 1992) [16]。英语作为西方各国广泛使用的语言, 英语混合语 (English mixed-languages) 最为人熟悉, 也是众多混合语中的一个分支, 指英语作为外来语和本族语接触所产生的新的变体。比如中国清末的半殖民时期所产生的“洋泾滨英语”便属于皮钦英语的一种, 也是英语混合语的初始形式。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通过新航路抵达中国, 在 16 世纪初占据了我国澳门地区, 开启了中西方之间的经济贸易。为了适应逐渐繁忙的中外贸易, 1557 年明政府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居留。而在 18 世纪初期, 广州出现的在民间广为传播的“广东葡语”便产生于这一时期。广东葡语是一种洋泾滨语, 后来这种语言成为广州地区主要流通语言之一, 也因此吸收了葡萄牙语中大量的商贸词汇。在 17 世纪, 中国广州成为了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混杂了中、英、葡等多国商人, 为了交流和贸易, 一种以中文语法结构为基础, 结合了粤语发音和英文词汇的语言变体——广州英语产生了 (马伟林 2004) [17]。到了鸦片战争时期, 英语作为清政府和西方国家的主要交流语言正式进入中国的贸易、外交、文化等领域。英美殖民主义者在广州、上海等地广泛开放通商口岸, 英汉混合语作为一种新的洋泾滨语产生, 替代了由于葡萄牙势力衰弱而地位降低的广东葡语。清政府也开始培养外语人才, 派学生赴美留学, 推动当时中国的外语学习。由此可见, 洋泾滨英语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冲击有着紧密的联系, 体现出当时汉语对外来语言的接受程度和交流需求, 也反映出西方文明对当时中国的冲击和刺激。

殖民主义伴随着的是语言和文化殖民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指强势文化由于具备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优势, 向弱势文化传播自身的文化等观念的不平等的国际文化交流现象, 通常伴随着政治或经济目的 (邢丽娟 2008) [18]。语言和文化有着深厚的联系, 而语言殖民主义则意味着优势语言更大范围的传播。在语言接触中的优势语言会被选作媒介语。在近现代时期, 西方文明飞速发展, 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上升, 西方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层面拥有较高的话语权, 也拥有较大优势, 其使用的语言便成为和语言接触对象之间的媒介语, 由此对一些本族语言产生一定影响, 形成不同的混合语言。例如近代以来, 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在全球的殖民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英语也被殖民者带到了世界各地, 一直到今天都是一种优势的全球性语言。然而有些地方由于缺乏深厚的文明基础和坚实的语言基础, 英语的入侵也导致了部分方言的灭绝。如美洲和澳洲成为 20 世纪世界语种消亡最多的地区 (邢丽娟 2008) [18]。

因此, 对混合语在语法、语音、语义、词汇等方面的进一步分析有助于探究某种混合语中, 本族语言对外来成分在各个方面的同化、吸收和改进。这些混合语虽然都是以语言接触为基础形成的语言, 但其背后设计的社会文化因素却较为复杂, 有些混合语是基于殖民入侵, 而有些则基于文明交流。亚洲的民族构成多样且复杂, 拥有悠久频繁且形式多样的语言接触历史, 也形成过较多混合语, 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对探究近现代文明对语言的冲击和影响有重要的作用。

4. 文明的冲击与亚洲语言的应对

近现代文明并非一直在丰富和促进亚洲语言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亚洲语言造成了冲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甚至给部分语言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 在或主动或被动地吸收外来文明和语言时, 亚洲语言也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法来保护自身, 从而使自身语言及其背后的亚洲文明得以延续和发扬。

在 17 世纪, 远在东洋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王朝的明末清初, 西方便开始了科技革命, 经历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一系列推动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的活动, 开始走向世界各地。在西方文明借助工业科技和宗教文化开始逐渐强盛的时候, 亚洲的国家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强盛的西方文明给亚洲国家的语言、文化、商贸等方面带来了冲击。如复杂多样的印度语言便和西方文明的冲击有较大关联。

经过工业革命和宗教改革的欧洲各国开始向亚洲扩张。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在 15、16 世纪左右将英语带到了印度, 并在印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 几乎控制了印度所有贸易。由于在印度的英国人不断增多, 使用英语进行贸易、沟通的人数也在不断上升, 英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这就对印度本土使用印地语等语言的人们形成了冲击, 为了应对不断扩张的西方殖民主义, 印地语等语言也在不断吸收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的词汇。与此同时, 由于印地语背后的文明文化支撑, 印度民族主义也在悄然兴起, 使得梵语的一些词汇开始重新活跃, 印地语在维护自身语言的同时开始融合外来语言词汇。

18 世纪, 语言成为了殖民活动的关键。为了应对近现代文明带来的冲击, 印度语言开始探索保护和发展自身语言的途径。印度语言发展进程在该时期可以被划分为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的语言发展和英国女皇统治时期的语言发展 (Schiffman 2000) [19]。在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 一方面印度本土民众开始接受英语的学习, 另一方面, 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也开展了印度本土语言学习的活动, 并成立了相关的学会, 在英国和印度教授印度古典语言等本土语言 (Mir 2006) [20]。在 19 世纪早期, 英语成为了教学语言之一, 且双语教育开始施行。最终《1837 年第 29 号法案》的出台标志着英语彻底成为印度殖民政府的官方语言。一直到 1949 年的印度联邦宪法中明确印地语的官方

语言地位,但印度语言中仍然能够发现不少英语的影子。

从印地语的发展来看,其应对近现代文明的冲击有几个特点:第一,以梵语的俗语为基础,具有悠久的文明基础。第二,印地语吸收了很多方言词汇,具有民众基础。第三,印地语吸收融合了当地语言和外来语言。但不论词汇语音和形式如何变化,其承载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文明艺术等内涵都十分厚重,也因此没有使印度语言没落,反而造就了印度文化多元的局面。除此之外,语言政策也是重要因素。官方采取单一的语言政策,企图使当地语言由本土转向英语,但是在地方区域层面又坚持多语主义,在推广英语的同时并不废止本土语言的使用和学习。在印度独立之后,政府采用单语主义,但多语化显著,英语反而起到了调和作用,这使得英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印度稳住了脚跟,逐渐呈现印地语、英语、区域语言相结合的多语化格局。

除了像上述印度地区语言对近现代文明冲击的被动接受,还有部分亚洲语言选择主动吸收新兴词汇等。1789年法国远征埃及,带着当时先进的西方文明,欧洲列强开始了对阿拉伯地区的入侵和争夺。为了学习、了解西方列强的先进科学技术,语言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埃及时任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便开办新式学校、创办报刊、建立外语学校和翻译局。大量的书籍被翻译成阿拉伯语,一些新兴词汇和外来词汇不断作为外来借词充实着阿拉伯语的词汇和语法体系。到了19世纪中后期,阿拉伯地区开始进一步学习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法国的议会和立法制度、英国的高等院校制度等多国制度、意识形态被借鉴应用。与此同时,阿拉伯地区的族群也将大量的本土文学,如阿拔斯王朝时期的文献、诗集、语言等方面的著作整理出版。这一举措使得阿拉伯文化逐渐稳固并丰富。

20世纪初,在阿拉伯语言学家的努力下,阿拉伯语在其基础上包容了诸多外来词汇,完善了其语言体系。当今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各国语言充实了一大批新兴词汇,并将语言更加标准化、专业化。1971年阿拉伯语学会联合会成立,对阿拉伯的民族文化、古典书籍进行整理和保护;联合阿拉伯语言学家对阿拉伯语词典进行修改和编撰,推广标准阿拉伯语。这一系列举措使得阿拉伯语不断适应当代社会发展,更加规范化。曾经中世纪数百年期间主要用语的阿拉伯语,现在是18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官方用语,也是联合国、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官方工作语言之一,在全球范围内使用者突破4.4亿人。

由此可以看出,相比较具有众多本土民众的印地语对外来语言的被动接受,阿拉伯语通过一系列的翻译运动、宗教运动和文学运动,主动学习和吸收近现代先进文明成果,不断扩充自身的语言体系以期适应当时社会文化发展,形成现在阿拉伯语的兴盛情况。

除了被动接受和主动学习,亚洲语言还有其它诸

多应对近现代文明冲击的方式,如中国的主动交流、闭关锁国和改革开放。再如一度被认为已经灭亡的犹太民族及其希伯来语采取的重新复兴方式等。这些应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该语言地区的文化和文明情况,也能够展现出近现代文明对该地区的影响情况。

5. 结论

以上各节主要从三个角度探讨了近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首先,对借词的出现和扩散加以研究可以探知文明演变以及某个时期族群的交流互动情况;其次,对混合性语言的讨论可以反映出某个民族的文明渊源和发展进程,展现语言和文明之间的关系;此外,亚洲面对当时先进的西方近现代文明,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明,为研究亚洲语言和文明的特质提供了丰富的实例。可见,近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是多方位多层次的,而语言学也能够从亚洲语言和近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入手,为亚洲文明和语言研究做出贡献。

针对国内语言发展状况的研究已取得较为瞩目的成就。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便提出了汉语语言文化的概念,展开了汉语语言和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其目的主要是探讨汉语语言文化的起源和归属(黄巽斋 1998:44-56)^[21]。但在亚洲语言的整体研究中,文明和语言之间还未建立起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必须认识到,面对文明底蕴深厚、受到多方文明文化影响的亚洲地区,社会统治权的更迭、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以及民族的宗教信仰对语言发展影响巨大,仅凭单一的语言研究或语言和某地区的文明发展研究不足以揭示亚洲语言和文明的关系。

总而言之,近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从宏观视角探索文明对语言的影响十分必要,应当客观对待近现代文明对亚洲语言的作用。此外,语言学也应当发挥其在亚洲文明和亚洲语言研究中的作用,充分将二者结合,深化文明和语言的关系,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目前针对文明和亚洲语言的研究融合度还不足,尤其是从语言学角度的探索还远远不够,需要开展更加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在文明的宏观框架下,从语言学角度探寻文明对亚洲语言的影响,在亚洲文明和语言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多贡献。

REFERENCES

- [1] Qian, C.D. (2021) *The Study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is Flourishing*.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Press.
- [2] Wang, L.G., Xu, Y.J. (2019) *Asian Civilizations' Contributions of Historic Significance and Constructing the New-Era View of Asian Civilizations*. *Social Sciences Abroad*. 05: 4-13.

- [3] An, Y.J. (1985) Comparison of kinship appellations in Chinese and Korean. *Journal of Yanbi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 38-53.
- [4] Berman, A.R. (2005) *Modern Hebrew. The Semitic Languages*. Edited by Robert Hetzro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 [5] Wang, R.L. (2021) On Studies of Loanwords in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 Sciences*. 20: 402-410.
- [6] Schmitz, P.C. (2014) Greek Words in Phoenician and Punic: Recently Identified Examples. *Aula Orientalis*. 32: 123-141.
- [7] Zhu, J.W. (2020) The Origin of Japanese Loanwords Entering Chinese: Take Shenbao and the Five Newspap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Examples. *Journal of Japanese Language Study and Research*. 04: 1-10.
- [8] Zhang, H.Y. (2016) Types and Impact of Chinese Loanwords on Tujia Lexical System.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06:69-78.
- [9] Shang, J.G. (2015)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ulture on The Phenomenon of Chinese Loanword in English. *Language Planning*. 17: 95-96.
- [10] Liu, S.B., Song, Y.Q. (2016) Chinese Loan Words in English and Its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2016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A: 237-241.
- [11] Erdenibaatar, B. (2017)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Mongol in Yuan Dynasty. *Mongolian Studies*. 48: 31-45.
- [12] Thomason, S.G. (2003) Social factors and linguistic processes in the emergence of stable mixed languages. in Yaron Matras and Peter Bakker (eds.), *The Mixed Language Debat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13] Bakker, P., Mous M. (eds). (1994) *Mixed Languages. 15 Case Studies in Language Intertwining*. Amsterdam: IFOTT.
- [14] Velupillai, V. (2015) *Pidgins, Creoles and Mixed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15] Haarman, H. (1986) *Language in Ethnicity—A View of Basic Ecological Relation*. Mouton de gruyter.
- [16] He, A.P. (1992)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Chinese - English Mixed Code.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01: 7-10.
- [17] Ma, W.L. (2004)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Pidgin English in China. *Contemporary Rhetoric*. 03: 21-25.
- [18] Xing, L.J. (2008) The Influence of Linguistic Colonialism on World Language and Culture. *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S1: 233-234.
- [19] Schiffman, H.F. (2000) *Indian Linguistic Culture and the Genesis of Language Policy in the Subcontinent*. Routledge: 159-183.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021569-12>.
- [20] Mir, F. (2006) *Imperial Policy, Provincial Practices: Colonial Language Policy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Indian 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43: 395-427.
- [21] Huang, X.Z. (1998) *Discussion on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Changsha: Yulu Press.